

#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砾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文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高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丁茂战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方芳

第 177 期 (总第 289 期) 2016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五 丙申年十一月十一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罗“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其可能断送美国的繁荣,而在于推进繁荣后可能带来的长期环境成本。

## “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

■ 陆丁 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

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声称要让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 3.5% 以上,让美国“再度强大”。然而,数百名美国经济学家在竞选最后关头却发出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当总统“将威胁到美国的繁荣”。所谓“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呢?

吊诡的是,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在政治理念上势如水火,双方在这场竞选中各自提出的财政政策上却有个“共识”:都提出要在上台后积极扩张赤字财政。奥巴马当政期间,赤字财政已经相当庞大,把美国国债与 GDP 的比率从 35% 增加到 70% 以上。据估算,克林顿的财政方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把国债比进一步推高到 85% 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会使国债比上升到 105%。

在花钱上,两个候选人都主张加大投资,维修更新老的基础建设。克林顿团队保证在五年内增加 2750 亿美元使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到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振兴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内投入一万亿全面更新基础设施。

其实,过去这几年,多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大力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著名学者如布莱德(Alan Blinder,克林顿团队的经济顾问)、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奖得主、专栏名笔)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表面上看,自从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扩张到第九个年头,失业率也从衰退时的 9.6% 降低到目前的 5% 左右,接近所谓自然失业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缓慢。2015 年实质人均 GDP 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 3%, 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 GDP 增长率只有 1.8%, 今年预计只能达到 1.5%, 远低于 2000—2007 年间 2.65% 和 1981—1999 年间 2.26% 的年均增长率。尤其是就业人数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只有 56%, 比危机前降低了 4 个百分点,相当于闲置了一千万人原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力军。

当经济成长低于其潜在趋势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是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八年前,正是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合力扩张,积极刺激总需求,才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灾难。不过这八年来,从欧元区到北美,经济增长疲弱,复苏步履蹒跚。各国央



行利率一降再降,货币政策已经耗尽“弹药”,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财政赤字扩张,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著名学者如布莱德(Alan Blinder,克林顿团队的经济顾问)、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奖得主、专栏名笔)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拉戈德的主张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都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由于赤字财政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负担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将来财政状况就会改善,不愁这几年债台高筑。

近八年来欧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催生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观念。原先主流学派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只能刺激短期总需求,对长期供给和增长潜力是没什么影响的。然而,一些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深度衰退已经损害到美国的生产潜力;由于长期经济低迷,目前的潜在产出比按照危机前增长趋势推算的产出水平整整低了 7%! 因此尽管目前的失业率已经接近自然失业率,仍然有必要用积极扩张的公共政策给经济加温,

创造更多就业,把上千万的闲置劳动力动员起来,营造更光明的成长前景,鼓舞民间企业更积极地投资和创新,提升长期生产潜力。

其实,这种认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进长期供给的非主流理论早就萌芽。荷兰经济学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推导出经济成长前景的改善会有助于现阶段生产力提升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所谓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业,也会增进投资信心,促进生产力,提升长期供给潜力。这一理念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发展出“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数据实证。

这些经济学的“新”观念,虽然仍有争议,但已经问鼎主流。根据这个观念,在当前经济长期低迷的形势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正是把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趋势所必需要做的,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上策。

除了双倍的克林顿方案的财政扩张规模,特朗普政策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企业所得税,并把现有的所得税率从七阶累进简化为三阶累进。尤其是把企业税率从 35% 降低到 15%, 将一举摘除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企业税率最高的“帽子”,成为税率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用一次性的优惠税率(10%)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也有助于增拓民间投

资金来源,改善国际收支。大幅度减税意在激励工作和投资,这个供给学派的理念曾在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得到实践,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局,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开启接下来二十多年的繁荣,也造成了一大波国债的膨胀。据预计,特朗普提出的减税规模会超过里根时期占 GDP 约 3% 的规模,将高达 GDP 的 4%。加上特朗普打算取消简化产业规划,尤其是放宽对传统能源如煤炭和页岩油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放弃美国在碳排放上作过的国际承诺,这些都会让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经济学”的增长绩效。

特朗普经济纲领中最令主流经济学家担忧的是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只要消除美国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 GDP 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

不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界并不否认多年来产业贸易全球化给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也不认为历来美国主导的自贸协定都对本国有利而无一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全球化经济方略确有检讨修正的必要,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经济学界对全球化的反思。

总之,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威胁断送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在于推进增长繁荣后会带来的长期环境成本;“特朗普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理念的差异,不在于要不要搞赤字财政扩张和调整外贸关系,而在于如何实现贸易再平衡、避免贸易保护之害。作为一位注重实效的精明富商,特朗普能觉察到这些并做出明智的权衡抉择吗?

## 钱颖一: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有更高的境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近日在“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说,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他认为,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计划经济成分会增加。但是,机器永远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有激励问题。这既可以是正激励问题,即有积极性去做一件事,也可以是负激励问题,即努力避免去做另外一件事。趋利避害就是人对激励做出反应的通俗解读。所以,激励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钱颖一认为,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是信息收集的问题或计算的错误,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进展,计划经济好像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激励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钱颖一在谈学术研究的感悟时,他讲了三点看法: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



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改革破产程序中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中有分析框架、使用分析工具,并且经过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工具,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所以理论创

新,既有创造性,又有延续性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经济搞得与中国经济学搞得并非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有影响研究的前提。二十世纪中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 1/3 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

第一,这些历史性事件中确有不少重要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现在高校中的经济学技术性训练比 20 年前、10 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最近,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如果说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比技术训练更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第三,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争一流(国内一流或世界一流)、拿诺奖、为国争光。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第一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费米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称其为殿堂。(卫星整理)

## 陈向阳、卢淑敏:构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运行机制

陈向阳、卢淑敏在《区域经济评论》2016 年第 6 期撰文认为:中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即将在 2017 年构建,但是由于中国现在的碳交易市场运行是依赖于依赖能源和资源的传统工业,而中国的传统工业因为能源和资源的分布不平衡造成区域差异,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在对碳排放量控制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构建应该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因为全国行业众多,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即使是构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依据目前全国的经济现状来看,将现有的交易运行机制、交易所等全部取消再重新设立是不合理的。所以第一阶段应整合连接七大试点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对它们做统一规范,再以七大试点地区为基础向全国各地辐射,形成一个完整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

(1)法律基础的建立。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必须先出台相应的法律作为基础,尽快出台专门针对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就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减排配额分配、监管、交易流程以及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统一界定,同时,还要对违反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责任和解决方式进行统一规定,从严肃处理,借助于有威慑力的法律制裁手段,约束碳排放交易的参与主体。

(2)总量控制与配额分配。目前国家对于碳排放总量的总量控制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应该通过立法将碳排放量列入总量限制中,并且设立专门的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以规范排放实体企业的排放控制义务。国家总量控制的制定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容纳相结合。由于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中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应该统一采取免费为主(标杆法)、拍卖为辅的原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的意见。这样会减少发行阻力,促进碳交易制度的发展。

(3)交易体系与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前提就是逐步整合已有的环境交易所,制定统一的碳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就如证交所一样,全国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碳交易,同时连接七大试点区域来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核查机制,对相关排放源的排放量进行有效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要有基本统一的规范,并且第一阶段要有国家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调整相应的配额价格上下限,以减小市场风险。碳排放权交易涉及企业的财务资料,因此,在会计和审计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应做出详细的划分和规定,保证交易市场的顺利运行。

(4)履约机制。为了构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必须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履约机制的构建。首先,中国要完善与履约机制相关的法律配套法律法规体系,不但在国家层面立法,更要在地方确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以对那些不履约企业进行的惩罚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和支持;其次,中国要总结与分析目前国内相关约束性目标考核机制的经验,来制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履约机制;再次,通过积极调研重点排放行业典型企业的减排成本和国内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情况,建立并完善中国行业企业减排成本数据库,用以评估不同类型企业的履约成本,为确定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履约机制的惩罚额度提供数据支持;最后,积极召开相关问题研讨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并根据他们的建议调整,使履约机制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得到提高。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出现的问题的修正,也是对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发展的推进。因为免费分配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对碳交易市场活跃度贡献不足,不能很好地反映价格机制碳排放权的配置效果,所以第二阶段应该引入拍卖方式。

对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需要在省域分配配额时采取拍卖方式拍卖,相对于固定价格出售方式来讲具有以下优势:交易方式更加简单、高效,成本更低;拍卖方式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更有利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种稀缺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使那些生产效率高的、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可以利用同样数量的碳排放权指标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碳排放权指标流向环境效益高的企业;拍卖有助于反映环境资源的真实价值。政府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去发现碳排放权指标的真实市场价格,这种方式使碳排放权指标的分配更贴近环境治理成本,能促进减排计划的进一步完善。

在第二阶段,因为碳交易市场的进程推进,交易价格会逐渐反映真实减排成本,所以政府必须逐步放松价格调控机制,直至最终取消。在第一阶段,碳交易市场主要以碳现货交易为主,而在第二阶段,可以大力发展碳期货市场,来逐步增强碳市场的流动性,促进其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并且利用金融机构的参与来开发金融衍生品,提高市场活跃度。(卫星整理)